



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

□王汉斌口述 刘鸿泽整理

今年是北平解放70周年，想起当年，傅作义签署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新闻轰动一时，犹如原子弹爆炸，震惊天下。和平协议书的签署，让傅作义统率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大军，兵不血刃，实现和平改编，千古古都 and 数百万百姓免于战火之灾。

当时我是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至今我还记得，1949年1月22日，凌晨刚睡下的我被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鞭炮声唤醒，翻身起床，迎着第一缕晨曦，不禁自言自语道：“和平取代战争，人民得以安定，国家得以复兴，这就是近百年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与理想。这个理想在我们的努力下，实现了！”

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基本成熟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失败的命运已成定局。党中央决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1948年7月，筹划和谈的各项工作逐步开展。中共地下党在敌人心脏——“华北剿总”的一系列工作也已经有些成效了。对于如何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去做傅作义身边人员的工作，我们当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具体的安排。下面讲讲我和李炳泉、刘时平两位同志的联系和工作。

时为南系职青支部书记的李炳泉与我同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任职。李炳泉和刘时平是西南联大的同学，还是新闻界的老相识，是两位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他们联手在“敌人心脏”开展工作。

在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之后，我与李炳泉经常根据刘时平同志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方面获得的情报，研究傅作义的动向。

建立秘密联系通道

1948年初，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傅作义将军周围的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北平地下党最后梳理出这样几位跟傅作义“真正说得上话”的人——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其中，曾延毅、杜任之与刘厚同是一条线；李腾九与邓宝珊是一条线；傅冬菊是一条重要的内线。我们北平地下党组织把这三条线视为三条秘密联系通道，积极开展工作。

第一条联系通道：从1948年春夏开始，曾延毅、杜任之利用与傅作义保定军校同学的关系，国民党中将幕僚长刘厚同利用与傅作义的师生关系，出面对傅作义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第二条联系通道：从1948年10月开始，李炳泉同志与他的堂兄李腾九加强联系，并通过李腾九与“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接触，工作取得一定进展。

第三条联系通道：从1948年11月初，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即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从天津调到北平，

开始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

建立秘密联络站——东皇城根62号

1948年10月末，天气越来越冷，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在马路上面会交换情报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地下斗争需要了，我们急需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

没办法，我只能去找地下党员李树藩，他在中央航空公司当报务员，他曾答应帮我解决这个“当务之急”。我找到李树藩，只见他一脸的喜气。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准备租房，现在相中了一个地方相当理想，约我明天去看看。

第二天，我按指定的时间来到东皇城根62号。李树藩告诉我，62号的房主是国民党空军大队长，要逃到台湾去，所以准备把房子出租，介绍人开价每月租金两块大洋，而隔壁的63号虽然房租每月只要一块大洋，但条件远不如62号。我看到62号是一栋独立的小洋房，有客厅和一间卧室，窗户是双层玻璃，厨房灶内有盘水管，可以洗热水淋浴。此外，还有一间可供佣人住的小屋。室内的陈设更让我眼睛一亮——客厅里摆着李树藩与诸有琼的结婚彩照，放着一整套紫红丝绒沙发，这是外国使馆的旧货。这些都会让“查户口”的国民党军警、特务们产生错觉，可以起掩护作用。作为接头谈话的地方，这座62号院子实在是个理想的场所。

从此之后，东皇城根62号就成了北平地下党一个重要的联络地点，许多重要的情报在这里传递；许多重要的约会在这里进行；许多紧急的工作在这里研究、布置……

傅冬菊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傅冬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傅冬菊是傅作义和原配夫人张金强的大女儿。傅冬菊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我们成了同学。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我介绍傅冬菊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

1948年5月前后，中央已提出要争取傅作义。1948年11月下旬，根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党学委决定把傅冬菊从天津调到北平来，全力以赴地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在傅冬菊要从北平回天津的时候，我派人到火车站把她接回来。为了便于和傅冬菊联系，我还把周毅之也一并调来北平当地下党联络员，需要时可以通过他找傅冬菊。

傅冬菊以照顾父亲生活为由留在了傅作义身边，开始自己的特殊工作，可以说，她的工作细致而周密。

在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的初期，我大体上是天天同傅冬菊碰头，我们就在北京饭店的门口，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有时通过傅冬菊的丈夫周毅之联系。后来有了东皇城根62号，就有了固定联系地点。我听她汇报做傅作义工作的情况和傅作义的动态，并且基本上是天天把傅作义的情况通过地下电台报城工部再转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我要求傅冬菊每天到傅作义办公室，如果傅作义开会，她就在别的房间等着。

傅冬菊不仅将观察到的父亲傅作义思想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如发脾气、情绪低落等情况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作汇报，而且因不满父亲的一些作为还与之正面冲突。傅冬菊的话对傅作义震动很大，也让他思考很多，对于傅作义的思想转变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以签订“和平协议”的方式使傅作义将军统率的大军，兵不血刃，实现了“化干戈为玉帛”，创造了毛泽东称赞的“北平方式”，为后来解放湖南、新疆、云南等地提供了范例。

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在中国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且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它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身有了新了解和新认识。

（摘自2019年第1期《百年潮》；口述者系第七局、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整理者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台港澳合作交流中心、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退休干部）



□ 宁战宏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45岁生日。当天晚上，他在办公室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对自己提出了严格要求：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向群众学习。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领导干部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永远需要自觉的道德修养。在这方面，周恩来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活到老改造到老

周恩来反复强调世界观改造的艰巨性和反复性。“我的确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都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

周恩来不仅把道德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而且把道德修养看成是党员终生的必修课。“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的真实写照。

□ 栾吟之 梁建刚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拉开帷幕。举行会议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当时是李达的寓所。一大会议上，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时隔一年，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成员等，

毛泽东早年的一则文化广告

□ 樊宪雷

1920年，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筹建了一个文化书社，主要销售中外各种反映思想变革的图书报刊，诸如《达尔文物种起源》《鲁宾孙先生的思想》《新青年》《少年中国》《新生活》等，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书社开张后，如何扩大影响，打开销路，成为毛泽东等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是颇有头脑的，他拿起手中之笔，起草了多份文化广告加以宣传推广，包括《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等。这些文化广告，或侧重于所售书籍种类列举，或侧重于思想内容概述，或侧重于读书方法介绍，各有不同、相得益彰，读来毫无广告推销之感，倒有思想启发交流之雅趣。其中，《读书会的商榷》一文很值得一说。

《读书会的商榷》全文不足500字，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读书会的好处，概括起来就是：图书共享，切磋讨论，集资买报刊。要知道，当时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主要靠书籍报刊，而印刷技术又远非今日之便

捷，故而书报虽广受欢迎但价格不菲。特别是对青年学子来说，大肆购书堪称奢侈之事。即便如鲁迅，在当时也常常抱怨购书费用之昂贵。1912年他在日记中记述：“审自五月至年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由此也难怪乎时人哀叹：“在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时候，薪水收入拿来对付吃穿住都有问题，又怎能顾到不能补肉长肌的精神食粮呢？”自然而然，毛泽东的点睛之笔也落到了卖书之事上来：“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虽说是为了售书毛泽东才大扬读书会之益处，但客观地说，对于读书会他的态度是真诚的。这不仅因为之前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提倡穷子弟组织读书会合作买书、交换阅读；而且在其后的岁月中，他也多次组织读书会，并从中多有所获。

言行一致以身作则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员领导干部只有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才有号召力。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周恩来始终自觉地坚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带头做到；凡是要求别人不做的，他带头不做。他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人、感染人、昭示人，成为党员干部优秀的行为典范。

1958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反对铺张浪费。一次，周恩来在广州开会，服务员送上茶水，却

共12名共产党员集中到一起，召开了二大。

在为期8天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

这意味着，二大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事业进入了一个薪新阶段。

至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向着更

周恩来的道德修养之道

没有收费。周恩来主动交钱，服务员仍然不收，设法结账。周恩来当即严厉批评道：我在北京刚签了字、发了文，不许招待烟酒。现在你们不收钱，以后还怎么执行？1963年2月，在无锡视察期间，周恩来来到蠡园参观。他问陪同的市委负责同志：“买过门票没有？”那位负责同志根本没有在意此事。周恩来却十分认真，马上清点人数，当场购票，把一起去的陪同人员的票也买了。

古人云：“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讲廉政、讲道德修养，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身体力行。如果说一套，做一套，那只能是“台上你讲，台下讲你”。言行不一，不仅无法取信于人，更无法取得实际效果。对于道德修养、“为民、务实、清廉”和反腐倡廉等，有些干部只是写在纸上、讲在嘴上，实际上并不当一回事。他们处处为个人利益着想，争名夺利、争权抢位，坚持“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

高尚的人品、良好的道德和坚强的党性需要长期学习和严格锻炼才能形成。因而，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有目的、自觉自愿地经常自省、自警、自励，自我约束、自我加压，对于加强道德修养格外重要。这就需要各级党员干部从小处着眼、从点滴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严格要求敢于担当

这是周恩来道德修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领导干部担负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责任，其表率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些领导干部总是以改造别人自居，党性修

清晰的道路前行。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以上，工人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组织程度也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摘自2011年6月7日《解放日报》，原标题为《党章诞生的地方》）

第一次详细阐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党章

□ 张琳珏 何虎生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前，自1955年9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胡乔木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经过反复酝酿与修改，八大党章最终在八大上讨论通过。八大党章共九章、六十条。关于党的纪律，同七大党章相比，在结构和内容上并没有原则性改变，但新增的一些具体规定和提法颇为重要。

八大党章深入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总纲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并明确“党的民主原则不能离开党的集中原则”。这是中共第一次详细阐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加强党的纪律和组织建设、维护党的纯洁和团结统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此外，八大党章还确立了党的纪律处分相关内容：规定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章和国家法律，“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

养、为人民服务虽然也讲在嘴上，但都是说给别人听、要求别人干的，自己并不实行。对此，周恩来指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周恩来一再指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周恩来多次强调，领导者要搞好工作，要与群众搞好团结，就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共产党员对自己要求必须更严些，要起到模范作用。他认为，领导干部只有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各项管理工作才能顺利推进。

工作上出现差错是难免的，每当有同志指出来，或者自己发觉后，周恩来总是首先承担责任，真心诚意地反复公开检讨。他说，“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周恩来经常告诫广大干部要有勇气面对现实、面对错误；有错误不怕揭露，要敢于承认和改正。他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

党员领导干部应该以周恩来为榜样，学习他终生坚持自我改造的精神、严于律己的优秀品德、廉洁勤奋的工作作风，在平凡中成就伟大、在奉献中实现升华，持之以恒地加强道德修养，塑造高尚的人格形象，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正实现共产党人的价值。

（摘自2018年第4期《新湘评论》）